

分层融合视角下族群融合的弥合机制研究^{*}

——以新加坡华族为例

王开庆¹，史秋霞²

(1.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江苏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 江苏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关键词] 新加坡；分层融合理论；族群融合；弥合机制；“沙拉碗”

[摘要] 在“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新加坡华族内部存在的诸多融合裂痕，也使华族新成员面临融合困境。论文借鉴分层融合理论中的弥合思路，分析了新加坡社会中的制度性、组织性及互惠网络弥合机制及成效，总结了新加坡华族新移民的融合模式，探讨了其中政府政策与社会接纳间的关系以及亚文化的形成。

[中图分类号] D634.3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21)01-0026-08

Integration Mechanisms through Lens of 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 Case of Singaporean Chinese

WANG Kai-qing¹, SHI Qiu-xia²

(1.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ociology,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ociology,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Key words: Singapore; 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 Chinese overseas; integration mechanism

Abstract: Through a lens of "Salad Bowl",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s a whole may be understood with many internal segmentations, which however create a dilemma for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tegrating into Singapore.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ierarchic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various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mong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Singapore and the effects on the local society at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personal levels. The research may significantly noticeably generalize a model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tegration into Singapore. It also look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icial policy-making, societal accepta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subcultures in Singapore.

一、“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的新加坡华族

1965年以来，通过构建“CMIO”模式，即“新加坡社会是由华人（Chinese）、马来人（Malays）、

[收稿日期] 2020-03-06；[修回日期] 2020-12-25

[作者简介] 王开庆（1982—），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移民研究；史秋霞（1982—），女，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移民研究。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SH006）之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作者对本文的解释和任何其他错误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人 (Indians)、其他种族 (Other) 四大族群组成的总和”，新加坡政府塑造了“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均享有独立且平等的地位，并在语言、文化及宗教等方面保持各自的族群特性。^[1]

在移民政策方面，新加坡经历了先松后紧的发展历程。1990年，新加坡政府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高端人才进入，移民人口数量迅速上升，中国和印度成为主要移民来源地。^[2]然而，2000年起，迫于公众对移民政策的反对以及互联网上抵制的升级，移民政策开始收紧，^[3]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减少。^[4]新加坡的融合理念如“沙拉碗” (salad bowl)，对种族差异性的有意保留，使得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融入由某一族群构成的社会体系中。因此，在已有的种族架构下，中国新移民被国家期许能成功融入华人社会，为华族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维持现有结构及社会稳定。然而，受多方因素影响，华族融合状况并未如政策设想般顺利，其中存在诸多的融合裂痕。

根据国籍与就业双重身份，我们可将新加坡华族划分为公民、永久性居民、外籍人才与外籍工人^①四大类型。《“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的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研究》一文，全面呈现了新加坡华族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5]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密集型岗位人员面临结构性失业背景下，低技能的新加坡华人也将面临更大的向下流动风险。受就业政策影响，即便是取得公民、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新移民，仍旧可能面临就业与居住的不稳定。^[6]此外，新加坡华人并未将新移民自然视为“同族”，尤其是对那些中产阶级背景的华族外国人才，排斥情绪与日俱增，华族内部新老成员间也存在清晰的群体边界。^[7]在致力于成为“全球化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如何处理跨国、跨族人才涌入所带来的多样性与多族群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同一性之间的关系，成为新加坡政府急需攻克的难题。作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改善当前华族融合，提升族群凝聚力，不仅是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华族成员生存与发展的长远诉求。

当对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有了清晰认识之后，有必要继续思考在此融合框架下如何破解华族社群的融合困境，如何构建融合裂痕的弥合机制。本文将影响深远、应用广泛的分层融合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其弥合思路深入剖析新加坡社会中现存的弥合机制及其成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新加坡华族新移民的融合模式等内容进行探讨。

二、分层融合理论及其弥合思路

分层融合理论为中层理论，源于对经典同化理论 (classical assimilationist theories) 的反思。经典同化论倾向于将移民融入移居国视为平等、单向、自然发生的过程，是一个随时间推移逐渐放弃原有文化及行为模式、内化移居国文化及行为模式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有冲突、磨合，但最终会融入移居国主流社会。^[8]然而，此观点无法很好回应西方世界中不同族群在移居国融合状况的差异性。后续学者虽通过扩展美国主流社会的内涵以期缩小理论与现实间的差距，但仍将融合视为由母国到移居国的单向过程。^[9]分层融合理论 (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 为周敏和波特斯 (Alejandro Portes) 在 1993 提出的“分层同化理论”，^[10]该理论形成于对 1965 年后移民子女融入美国社会的结果及族裔差异的分析，是继“经典同化论”后最有影响力的移民理论之一。在此将“assimilation”译为“融合”，一是为了更好凸显新加坡多元的社会结构及“沙拉碗”式族群融合理念；二是为了说明华族融合涉及两个层面：融入新加坡华族社会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11]分层融合理论突破了线性思考模式，将移居国视为多元多层的社会，将移民融入过程置于充满种族不平等及隔离的融合环境中考虑。

在分层融合理论看来，移民与子女的融入过程及结果是多面的：第一，遵循原有同化论思路，移民通过不断的经济整合与文化适应，随时间推移实现融入移居国主流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社会）；

^① 在很多移民研究中，是否将“合同劳工”纳入讨论范围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学者认为，合同制工人在移居国居住的时间有限，受地方移民政策的影响，难以在移居国获得居住权。本研究之所以将外籍工人纳入讨论范围，是因为所探讨的是新加坡社会的华族融合，包括在此生活、就业并与其他华族成员接触的工人。

第二，因结构性障碍而融入移居国边缘地带（如贫民窟），融入并建构与主流社会不相符甚至冲突的亚文化，向下流动风险增加；第三，策略性地在移居国主流社会与族裔社区间做取舍，通过保留族裔特性，重建族裔社会网络及组织，激活族裔资源，实现通过族裔优势累积融入移居国中产阶级。^[12]

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移民的融入过程，例如移民的经济、教育和技能等个体特征，在母国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迁移方式，还有移居国的公共政策、劳动力市场、移民在移居国社会经济地位、公众态度和族裔社区的支持等。^[13]其中，个体特征与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移民在移居国的居住空间、子女教育及接触人群。劳动力市场则对移民融合具有结构性影响，当知识型与劳动型岗位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蓝领工人的经济收入将受到巨大影响，而新近到达的移民大多进入此行业。^[14]此外，制度性歧视与区隔加剧了受排斥移民在贫困社区的高度集中，这种集中为对抗性亚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土壤，并经由同辈群体互动影响移民下一代对移居国社会的认知与行为。当向上流动遭遇“天花板”时，受负面情绪影响，底层青年更有可能以挑战权威、否定中产阶级价值观与道德体系的方式维护自尊。^[15]面对外在环境影响，家庭关系与族裔网络尤为重要。当移民子女受外界环境影响面临向下融合风险时，代际和谐的家庭能够凭借家庭关系或族裔资源顺利抵御风险，^[16]族裔社区可能会给移民子女带来丰富的资源与族群自豪感，也可能除自卑感外再无任何贡献。

可见，移居国政府的援助计划、无偏见的社会环境及多元丰富的族裔网络资源，均对移民的融合历程有着重要意义。^[17]本文将借鉴分层融合理论中这一弥合思路，尝试剖析新加坡社会现有的弥合机制及其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华族内部所存在的融合裂痕。

三、融合裂痕的弥合机制分析

（一）差异性包容中的制度弥合

新加坡族群融合是建立在尊重差异的理念基础上，多元共存已成为新加坡人的标志性特征。如教育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在2015年“种族和谐论坛”上所言：“尊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这是作为新加坡人所珍惜的东西。”^[18]此理念在新加坡的居住格局与学校教育中得到充分体现。1960年前，新加坡居民大多居住在殖民政府所建立的独立民族聚居区内。为破解种族居住隔离难题，住房和发展委员会（HDB）重新安置公共住房，并通过“种族配额制”强制执行，确保各地区居住空间均能反映新加坡的种族构成，在共同生活空间下，学校、市场、运动场等公共场所为族群接触、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促进族群间的融合。^[19]学校教育中，学生除英语外，还须学习一门“母语”，其种族身份决定了学习的语言种类，华族为华语。通过上述日常生活化的融合实践，尊重差异的新加坡人形象得以不断内化。

2009年，为进一步推进新加坡人与新移民间的互动，新加坡成立了国民融合理事会（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任命“融合与归化倡导员”，通过家访、社区活动等形式帮助新移民融入。敦促新移民通过学习英语，与当地人的互动，参加社区活动等方式，从自身做起融入新加坡社会。^[20]同时，鼓励现有本土民间团体吸纳新移民，并通过自身资源促进其融入新加坡社会。如李氏家族协会新移民约占其会员的比例为10%。^[21]成立社区融合基金（1000万新元），支持开展增进新加坡人与新移民的交流活动。2011年开启了针对新公民的“新加坡公民之旅”，通过文化遗址考察、社区共享等活动，促进新公民顺利融入。^[22]可见，在尊重新移民的差异性基础上，融合还意味着学习内化新加坡共有的价值和社会规范。

然而，为吸引更多符合条件的新移民获得公民身份，也为缓解外籍人口大量涌入给本土居民所带来的不满与焦虑，新加坡政府区分了公民、永久性居民、外籍人才、外籍工人能够享受的权利和福利，充分体现了“新加坡人优先”的原则。例如，从事建筑、家政、食品服务等行业的低技能外籍工人，在新加坡的生活受到严格控制与监管，严禁自由就业及与当地新加坡人结婚，更难以获得住房与永久居留权。^[23]外籍人才被视为新加坡发展的驱动力，不仅可申请永久居留权，移民政策未

缩紧前还可享受补贴价购买公共住房。^[24]但受公众压力影响，外籍人才获得永久性居民和公民身份更加困难，在就业中优先考虑公民的权利。^[25]

可见，差异性包容下的融合，重在新公民融入新加坡已存的“CMIO”结构。进入新加坡社会的华族成员，因自身携带的资本不同，在住房、职业、福利与机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在公民优先的制度设计下，制度性弥合更多遵循的是单向同化思维，忽略了华族内部成员的差异性及其关系的复杂性。

（二）促进适应与交往的组织弥合

除了官方的制度性弥合外，非营利性社团在族群融合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宗乡会馆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组建的团体，是新加坡华人相互扶持、落地生根的重要基础，在促进华族融合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也成为华族内部深度交流的语言载体。李光耀曾表示，本地宗乡会馆应帮助新移民掌握英语，为新移民开办英语课程。^[26]其次，与新移民社团联合组织不同主题的传统文化活动，协助新移民了解新加坡华人文化。端午节时，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办大型的“赛龙舟”活动且要求各类社团均参与。^[27]厦门公会主办的“国民融合千人博饼庆中秋”活动，参与人员广泛，包括华族及其他族群成员，为新老华族及跨族群交流提供了平台。^[28]第三，吸纳培育新移民的加入，既为会馆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也使新移民在参与过程中增加对新加坡及华族的归属感。八邑会馆协助无法注册的“新加坡潮汕留学生联合会”进行正式注册，成立“新社团会馆青年团”，对接“新潮留”留在新加坡的会员，将其发展为会馆成员。^[29]

新移民团体往往更具包容性，成员来自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社会背景，^[30]又可分为综合性社团与地缘性社团。综合性社团如华源会、天府会，其中华源会的成立宗旨为协助会员融入新加坡多元社会，促进会员之间的沟通，加强与其他社团的联系，丰富会员及家人的生活等。^[31]以各省为主要成员的地缘性社团，如天津会、山西会、齐鲁会等，也发挥着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搭建商业网络平台，促进新加坡与中国间交流网络的功能。然而，地缘性社团因其人数少、成立时间短，对综合性社团有着较强的依附关系。^[32]相对来说，综合性社团的影响力较大，与新加坡政府与中国地方政府的联系也更紧密。

除上述宗乡社团外，新加坡还有半政治半社会性质的社会团体——华社自助理事会（以下简称华助会）。之所以兼具政治性与社会性，一方面，该机构的运作经费、组织领导及发展方向均受到新加坡政府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其组织目标、服务内容在于扶持华族弱势群体，促进社会流动，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华族社群发起且主要服务于华族低收入家庭与个人的自助团体，华助会旨在培育并发展华族社群的潜能，将其打造为自力更生、力争上游、互助扶持、团结与和谐的社群。

华助会主要关注华族底层，其中向全社会开放的义工队伍与跨族群的文化活动，也为新移民扩展自身社会网络提供了途径。在2014年华助会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办的陪老人赏花活动中，690名义工中新移民及现居本地的外籍人士占到三成。^[33]活动中，义工之间、义工与服务对象之间交流话题丰富，涉及新加坡与中国的饮食、人际称谓、节日习俗等，还包括新加坡特有的禁酒令，组屋种族配额，咖啡的种类与叫法等。跨族文化活动也为新移民理解他族文化打开一扇窗，如让不同种族的孩子一起制作椰浆饭，用各种颜色的米粒制作印度吉祥图案。新老华族成员的实际接触，使参与者能够在轻松愉悦的交谈和共事中将对方从刻板印象中抽离，这种交往还可能继续延伸至私人网络，发挥互惠功能。例如，新移民帮本地华人寻找租客；本地华人帮助新移民寻找房源，邀请参加活动，诉说心事等。义工哥哥姐姐被青少年服务对象视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的还运用私人关系帮助服务对象联系医生治疗皮肤疾病等。^[34]由此可见，华助会中和谐的人际接触环境，不仅有助于群体偏见的逐步破除，向私人空间的延伸交往也可能为今后提高华族内部关系网络的紧密度奠定基础。

当然，受自身发展及载体的影响，各类社会团体所发挥的弥合功能也受到一定限制。一方面，传统宗乡会馆吸纳新移民力度不足，其功能与新移民实际需求间也存在差异。早期移民大多来自同一

地区，自发建立会馆，而新移民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收入稳定，视野开阔，能用英语进行交流。^[35]另一方面，以文化为主要载体，新老华族成员之间缺乏共鸣。新老华族无论在语言、习俗、交往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未将彼此视为同族。尤其是新加坡华人，不仅将新移民视为“他者”，同时将国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拥抱多元文化）作为建立新老华族边界的重要工具。^[36]

（三）互惠支持网络给予的资源性弥合

要真正激活并促使华族向上流动，不仅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生存性资源，更要提供相对稀缺的竞争性资源，而这些资源涉及广泛，需要多方供给。与此同时，国家在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同时还需兼顾社会公平，这均需综合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笔者认为，由彼此关联又各不相同的组织与个人构成的支持网络，实现了华族社群的资源性弥合，而这些组织与个人本身也从弥合中受益。下面继续以华助会为例，来说明这种互惠合作网络中所蕴含的资源类型及如何实现资源性弥合。

秉承新加坡强调个人责任的福利设计理念，华助会关注低收入、低技能的本地华族个人及家庭的实际需求，服务设计中既重视金钱、实物供给，也强调融入社会的谋生技巧与信心。通过技能提升、教育支持、家庭帮扶等方式增加向上流动所必需的人力、心理与社会资本。

职业服务中，“技能培训计划”主要为低收入、低技能的新加坡工友提供课程学费资助，且充分考虑到服务对象的差异性与服务效果，60%的资源用以协助掌握一技之长，40%的资源用于为向上流动提升技能。同时，采取一对一的职业规划辅导，发现有潜能的服务对象，鼓励并资助参加更高层次的培训。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加便利、合适的就业信息。教育支持中，针对学生的服务计划也是根据能力分为功课督导和育苗培育，前者重点为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学习辅导，后者则专门针对其中较有潜力的学生重点培育，使其不但可能获得更加优异的成绩，还有望凭借直接招生计划（Direct School Admission）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如在华侨中学就读）。家庭帮扶中，主要集中于减轻家庭教育支出、改善亲子关系、丰富课余时间。例如，为受助家庭提供开学礼包；与国家图书馆联办阅读计划，培养孩子阅读兴趣；通过参观各类博物馆、观看表演扩大视野，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均是不菲的教育投入。华助会还通过定期的问卷调查、家访等了解家庭问题，制定家长学习计划，提高家长能力，增进亲子互动。“跃升计划”则通过津贴、家庭导师与卓越发展三方面，以帮助有潜能受助家庭迈向社会较高层。

对阶层流动持积极、正向认知是至关重要的心理资本，即相信向上流动的道路是畅通的，通过自身努力能实现这种流动。一方面，通过对表现优异者减免部分费用、奖励金及提供更高层次资助机会、定期表彰等方式，及时肯定受助个人与家庭的各种努力，提升自我价值；另一方面，鼓励受助者以义工身份帮助其他成员，在助人中提升自身社会价值。例如，在家庭工作坊中为其他家长排忧解难，在特殊活动中充当义务理发师、主持人或执行员，在补习班中指导功课，与学生谈心等。综上，要避免华族成员面临向下融合风险的同时，还具备向上流动的能力与机会，制度性与组织性弥合虽然必不可少，但仅凭政府支持与组织服务是难以实现的。以华助会为例，由职能型组织、学校、企业、服务型组织与义工构成的互惠支持网络，为发掘华族底层家庭与个人的潜力提供了全面的生存性与竞争性资源。

四、结语：关于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融合模式

结合分层融合理论的弥合思路，笔者认为，新加坡社会中具有制度、组织、互惠网络三种弥合机制，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弥合功能。制度性弥合中，通过相关机构的建立以及鼓励民间团体对新移民的吸纳及转型，有意构建新老华族成员的和谐气氛。然而，在公民优先的制度设计下，制度性弥合更多遵循的是单向同化思维，忽略了华族内部成员的差异性及其关系的复杂性。组织性弥合中，随着传统宗乡团体对新移民的吸纳，以及新移民社团数量的不断增多，在新移民的语言习得、生活适应、社会交往等方面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宗乡团体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及新加坡华人以“多元文

化”为界的群体排斥等，对其弥合功能产生了负面影响。当然，华族融合不仅涉及新移民的融入，新老华族的互动，还涉及华族成员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向上流动。在互惠网络中，半政治半社会的华族自助团体在协助新加坡华族底层成员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资本的同时，也为消除新老成员偏见，体验多元文化，扩展新移民社会网络提供了机会。同样，华族成员对志愿活动的低投入，社会网络构建及功能延展的时间性，使很多新移民与中国家庭网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延长了其对新加坡社会的心理融入过程。

然而，由于环境不同，具有相似个人特征的移民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与社会阶层中具有不同的位置。因此，在分析移民融合模式时，除考虑教育、技能、语言、经验等个人特征外，还需关注移居国的融合环境。基于分层融合理论，笔者尝试总结新加坡华族新移民的融合模式。如表 1 所示，移居国的政策、社会接纳及族裔支持构成了复杂的融合环境，确实有助于发现新加坡华族社群的融合裂痕、形成及其弥合，提升了分层融合理论的延展性。

表 1 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融合模式

融合环境	具体表现	新加坡华族社群
政府政策	排斥 / 积极接纳	管理排斥：低技能工人 积极鼓励：外籍人才 部分优先接纳：永久居民 优先接纳：公民
社会接纳	偏见与歧视	新老华族成员
族裔社区支持	弱 / 强	强：公民 弱：永久居民 弱：外籍人才 弱：低技能工人

注：结合已有模型总结，原模型资料来源：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530 (1993), pp.74-96.

政策层面，国家对新移民的态度可分为排斥与鼓励两类：积极吸纳经济实力雄厚、专业知识强的外籍人才，鼓励其永久居留，获得公民身份，而对低技能外籍工人则进行政策排斥、严格监管。永久性居民确实享受到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与权利，但在“新加坡人优先”与移民政策缩紧的双重影响下，其融入时间及成本也发生变化。社会接纳层面，新加坡华人社会对同族外来者持有复杂的排斥感，这种排斥影响着新移民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及融入。族裔社区支持层面，宗乡社团自身发展的限制无法全面回应新移民的实际需求，新移民社团经济功能明显，缺乏对社会融入的关注，中国的家庭网络仍旧为新移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

分层融合理论指出，未受社会偏见影响的种族，其适应过程会更加顺利。不仅如此，文化相似性还能确保新来者拥有接纳性的社会环境，而公众同情心还能够有效中和政府的政策排斥。^[37]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种族政策实际上是强调种族间的多元，重视种族内部的同化。华族内部非但没有接纳性社会环境的生成土壤，文化差异与公众复杂情绪还形成了排斥性的社会环境，这种排斥也进一步影响了政策调整，缩紧的移民政策、“新加坡人优先”原则的提出均可视为政府对公众态度的回应。如何改善华族内部排斥性的环境，营造接纳性的环境理应成为今后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此外，居住隔离与教育隔离强化了那些向上流动渺茫的边缘群体间的互动，成为孕育对抗性亚文化的主要方式，通过否定主流社会文化与价值观来应对自身的困顿境遇。^[38]卷入对抗性亚文化的新来者，也有可能离原有的家庭期望与自身规划渐行渐远。当然，当族裔资本与凝聚力足够强大时，

不但能够抵御对抗性亚文化的影响，本身的族裔文化也影响着移民的认知与行为。那么，在新加坡社会中，当居住隔离不存在时，对抗性亚文化是否仍旧存在？如果存在，主要通过何种途径生成？对自身发展及华族社群融合有何影响？尤其是那些受到政策性与社会性双重排斥的外籍工人，他们通常成为政策上的重点控制对象，学术研究中的盲点对象。新加坡国会议员刘程强在人口白皮书辩论时曾强调：我们不单需要磨合成为公民的新公民，也必须面对还未成为公民的外来人民，当我们因为外来总人口数量太多而无法有效磨合时，新加坡人口的整体个性和素质也会改变。^[39]

[注释]

- [1] Ah Eng Lai, *Meanings of Multiethnicity: A Case-study of Ethnic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Singap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 Martin Perry, Lily Kong and Saw Ai Brenda Yeoh, *Singapore: A Developmental City State*,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1997, pp.76-79.
- [2] [25] Shaohua Zhan and Min Zhou, "Precarious Talent: Highly Skilled Chinese and Indian Immigrants in Singapo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43, No.9, 2020, pp.1654-1672.
- [3] [22] Saw Ai Brenda Yeoh and Theodora Lam, "Immigration and Its (dis) contents: The Challenges of Highly Skilled Migration in Globalizing Singapo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60, No.5-6, 2016, pp.637-658.
- [4] F. K. Han, "GE 2015: A Strong Mandate for a Changed PAP", *The Straits Times*, 2015, September 12, <http://www.straitstimes.com/politics/ge2015-a-strong-mandate-forachanged-pap>; T. Koh, "Ten reflections on GE 2015", *The Straits Times*, 2015, September 17,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ten-reflections-on-ge-2015>; Elaine Lynn-Ee Ho and Fang Yu Foo, "Debating Integration in Singapore, Deepening the Variegat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s*, Palgrave, Singapore, 2017, pp.105-125.
- [5] 史秋霞、周敏:《“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的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研究》,《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6] Saw Ai Brenda Yeoh and Theodora Lam, "Immigration and Its (dis) contents: The Challenges of Highly Skilled Migration in Globalizing Singapo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60, No.5-6, 2016, pp.637-658; Peidong Yang, "Differentiated Inclusion, Muted Diversification: Immigrant Teachers' Settlement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in Singapore as a Case of 'Middling' Migrants'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20, pp.1-18.
- [7] [36] Yasmin Y. Ortiga, "Multiculturalism on Its head: Unexpected Boundaries and New Migration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Vol.16, No.4, 2015, pp. 947-963.
- [8] 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33, No.6, 1928, pp.881-893.
- [9] Richard D. Alba and Victor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Assimilation and the New Immig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6.
- [10] [11] [12] [17] [37]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30, 1993, pp. 74-96.
- [13]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én G.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 xxix.
- [14] Lawrence Mishel, et al.,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42.
- [15] Min Zhou,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No.4, 1997, pp. 975-1008.
- [16]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én G.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85.
- [18] <http://www.moe.gov.sg/media/speeches/2015/07/08/opening-address-by-mr-heng-swee-keat-attheracial-harmony-forum.php>, 2016年1月31日浏览。

- [19] Beng-Huat Chua,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NY: Routledge, 1995, p.124; Ah Eng Lai, *Meanings of Multiethnicity: A Case-study of Ethnic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Singap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8; Martin Perry, Lily Kong and Saw Ai Brenda Yeoh, *Singapore: A Developmental City State*,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1997, pp.76-79.
- [20] Hong Liu, “Beyond Co-ethnicity: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tiating and Integrating New Immigrants in Singapo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37, No.7, 2014, pp.1225-1238.
- [21]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7月5日; 对新加坡三江协会主席的个人访谈。
- [23] Neil M. Coe and Philip F. Kelly, “Languages of Labour: Representational Strategies in Singapore’s Labour Control Regim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21, No.3, 2002, pp.341-371; Saw Ai Brenda Yeoh, Shirlena Huang and Joaquin Gonzalez III, “Migrant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Debating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acts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3, No.1, 1999, pp.114-136.
- [24] Saw Ai Brenda Yeoh and Weiqiang Lin, “Rapid Growth in Singapore’s Immigrant Population Brings Policy Challenges”,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profiles/print.cfm? ID=887](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profiles/print.cfm?ID=887). 2013年12月2日浏览。
- [26] 李国基、林文丹编:《宗乡总会联合中华总商会举办向李光耀、吴作栋致敬晚宴》,《宗乡简讯》2011年9月—2012年1月,第74期。
- [27] 《“跑旱船”庆端午》,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6月19日。
- [28] 范磊:《宗乡社团在新加坡国民融合中的角色与贡献》,《源》2013年第5期。
- [29] [32] 彭慧:《试析近二十年新加坡中国大陆新移民社团的发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 [30] Hong Liu, “Transnational Chinese Sphere in Singapore: Dynamics, Transform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41, No.2, 2012, pp.37-60.
- [31] 华源会网站, <http://huayuanhui.org/Home/About>。
- [33] 华助会:《拎着公公婆婆赏花去》,《动力华社》2014年6月刊。
- [34] 华助会:《投身义工行列 不让生命留白》,《动力华社》2011年10月刊。
- [35] 李承璋:《会馆的发展与新移民的融入》,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9月21日。
- [38] Mercer L. Sullivan, “*Getting Paid*”: *Youth Crime and Work in the Inner Ci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
- [39] “刘程强在国会辩论‘人口政策白皮书’的发言”, <http://wp.sg/2013/02/population-white-paper-mandarin-1tk/>。

[责任编辑: 乔印伟]